

第五章 結論

本篇論文試圖從地方感此一概念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後，探討地方感在地方政府透過地方博物館的輔助成立而被創造、發明，進而被塑造成一種反動且根著的地方感想像，而這種封閉且固著的地方感想像與當地居民在每日生活經驗中所形成的地方感經驗又有何差異？本文透過田野實地訪談地方博物館內經營者與文史工作者及地方博物館外的當地居民對地方感的表述過程，企圖透過地方博物館內/外之間對地方感的差異表述，對「地方感」此一概念重新反思其本身所具有的流動、多變特質。

論文中比較 Harvey 與 Massey 兩人分別對全球化下的地方感不同的詮釋，對 Harvey 而言，全球化的過程將會導致地方的瓦解與當代認同的分裂，並會伴隨著出現懼外、排外的心理及反動的地方政治，如反動的國家主義、競爭的地方主義、以及對地方襲產興趣的提高等。因而人們向過去尋找而努力建構一種更穩定或有界線的地方感，想要固定地方的意義，封閉與防禦它們。Massey 則質疑並提出有別於 Harvey 對地方感封閉、反動的不同想法，但她沒有否認近年來懼外、排外現象的出現，她認為對地方感的界定並不必然是反動的。在她看來，將地方等同於社群是有問題的，社群不一定存在於相同的地方（如相同興趣的朋友、宗教、種族、政治社群等）。另一方面，一個地方由單一個社群所居住是很少見的。再者，就算如此也不會只有一種單一的地方感，因為人們佔據了社群中的不同位置（Massey, 1994）。因此，她提出「進步式的地方感（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的可能性，她認為地方的特定性並不是來自長期內化的歷史，而是由特別的社會關係在一個特別的位置中會合並交織在一起所建構出來的。因此，Massey 認為不要將地方想成是有界線的地區，而應該將它想像為在社會關係與瞭解中關連的片刻（articulated moments）。因為這些關係、經驗與瞭解，有很大一部份是在更大的尺度中所建構出來的，而此將會導致承認一種外向的、包含更廣大世界的連結、以正面的方式來整合全球和地方的地方感。因此，Massey 認為必須要經由交互作用來建立地方感，因為地方感只有在將該地方與其他地方連結時方可建構而成。而一種動態的、內部衝突矛盾的、外向的全球地方感，當然是進步的，而不會是如 Harvey 所言朝向一種封閉、固著的地方感想像。

透過本篇論文對南方澳漁村的田野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在南方澳漁村中本身所存有的多元移民現象、宗教信仰衝突情形、男女性別分工結構等地方文化組成元素之中，封閉反動的地方感與開放進步的地方感均無法給予清楚明確的切割，而是此兩種既封閉又開放的地方感共同交織而成對地方的想像。我從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對地方感的建構現象，對照地方博物館外當地居民對地方感想像的差異，發現地方感形成過程的複雜性與多變樣貌，從這樣對照的方式，本研究發現在地方博物館的出現與成立過程，深受台灣社會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國家機器對

於本土化的政治想像影響，國家機器對於地方的想像與建構，企圖透過鄉土歷史的重新書寫與記錄，凸顯「台灣本土性」削弱「中國性」¹，進而在文化政策上以「社區共同體」、「社區總體營造」概念呼應主政者的「生命共同體」、「新台灣人」論述；而在地方政府的文化治理情形中，中央政府開始下放文化治理權力給地方政府時，地方政府在對地方文化取得充分的自主權後，便透過經費的補助、政策的規劃等方式開始進行行政地方的文化想像²，成為對「地方文化特色」的主要建構機構。

地方政府透過中央文化政策對「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想像規劃下，輔以「文化立縣」、「觀光立縣」的政策規劃，在宜蘭縣境內開始推動地方博物館興建的工程，企圖透過文化結合觀光的方式將地方型塑成為可供休閒、消費、觀光的遊憩大縣；並且透過生態博物館概念的提出，將宜蘭縣整體視為一座生態博物館，在縣內各鄉鎮中不斷地輔導成立公立或私人的博物館、文物館以做為宜蘭縣生態博物館的各個「節點」(node)，進而最後可以將宜蘭縣形成一座生態博物館。南方澳漁村即是在一九九四年宜蘭縣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中被挑選為優先試辦的「種子」社區之一，地方政府透過委託學術研究單位的方式，將地方的文化想像交付學術單位規劃地方特色的發掘與創造，進而透過地方博物館的成立，做為兼具保存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導引的基地。我試著從地方博物館的成立背景與政策輔助面向做為瞭解地方感被建構的可能，透過參與觀察與訪談的方式，企圖了解地方博物館在型塑地方感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文化政策如何介入輔助或主導地方博物館內展示物品的選擇以及地方感的建構過程；另外為了檢驗地方感本身存在的流變特質，透過觀察與訪談的方式對照當地居民在日常生活經驗中，如何透過自身的生命經驗與對地方的感受形成不同於地方博物館外的地方感。

5.1 歷史記憶做為地方博物館內對地方感建構的訴求

在第二章中我整理南方澳漁村的開發歷史是在日本殖民政府時期的開港才開始出現漢人漁民的出現，南方澳漁村在日本殖民政府未建港以前，是不同於台灣其他已開發的地方，所以南方澳漁村漢人歷史是從光復後才開始有大量的漢人漁民移居南方澳漁村。而漢人移民南方澳漁村的歷史紀錄，從文獻上與當地耆老訪談的過程中，可以得知南方澳漁村在人口樣態的組成上有來自全台各地的移民，而非如台灣開發歷史上從清代以來的移民歷史。南方澳自日據時期開港以來不過八十多年的歷史，歷史的紀錄與追溯上成為地方博物館、文史工作室在建構地方特殊性的的重要對象。在第三章中，我分析了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的成立背景與原因，發現南方澳地方博物館的成立與地方政府在政策輔助上有相當的關連，文史的紀錄往往成為地方政府在對地方居民索求共同記憶的重要工具，而地

¹ 參見蘇昭英(2001)，〈文化論述與文化政策：戰後台灣文化政策轉型的邏輯〉

² 參見黃國禎(1998)，〈文化政策、認同政治與地域實踐—以九〇年代宜蘭為例〉、慕思勉(1999)，〈台灣的異質地方—90年代地方或社區博物館的觀察〉

方博物館與地方文史工作室的成立便在地方政府文化政策上對地方的想像下成立，以做為地方的文化治理重要機構。

在地方博物館內的研究上，我透過以「觀光客」身份及之後表明「研究者」身份所獲取訪談內容的交互比對，發現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在館內展示內容與文史記錄重點的挑選過程中，對南方澳漁村的想像乃是透過地方政府與當地文化菁英的共同合作過程，以地方博物館做為對外展示的機構，佔據為「南方澳漁村」地方意象定義發聲的重要位置，然而，這個對外發聲的位置與角色，意圖凸顯的是地方博物館、文史工作者、文化菁英等對地方的想像與感受，但從地方博物館內的展示物品以及文史記錄的呈現內容中，記錄的選擇標準與展示事物的挑選過程中，發現地方政府透過文化政策介入南方澳漁村地方意象建構的權力之手也同時收編了地方文化菁英的地方想像構作過程。地方博物館成為地方政府、文史工作者、博物館經營者、文化菁英等對地方意象想像的空間場域，在地方博物館此一空間內，繁榮的、擁擠的、老年漢人男性漁民做為在地特殊性的表徵，南方澳漁村透過耆老的訪談記錄、老照片的陳列、舊機器的保存、貝殼的生態展示等技術，將南方澳漁村從現實的生活情境中拉出，成為供人憑弔、遙想、緬懷的懷舊空間，與博物館外的落後、外籍漁工與外籍配偶充斥、髒亂的生活場景等意象形成格格不入的強烈對比。

過去人文地理學者對「地方」概念的討論從早期將地方視為具有一定疆界領域的想像，認為地方的存在與認同是屬於實存的必然；晚進的人文地理學者則開始反省過去對於「地方」封閉思考的侷限；Harvey（1996）即提出地方是一個建構的過程，而非結果，打破過去將地方視為封閉且固定的領域想像。人文地理學者對於地方概念的重新反省與思考，「地方」一詞因而被重新討論、檢驗其本身所存在的意義，端視其放置在哪一個脈絡之下而有不同的意義界定。地方感的感受差異在新人文地理學者的研究中，發現在地方上的每一個體會因自身所處的階級、性別、職業、年齡、生命歷程等因素，對所處環境產生的地方感也會隨時變動（Pred，1983）。換言之，人對於地方的想像與感受是與整個社會關係結構所共同形成與轉變的，對於地方本身所象徵的意義，也會因為個人在各種時空、處境下的不同，不斷地流變。從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內對地方意象的描述與展示，我發現這是經由博物館經營者、文化菁英與地方政府文化政策共同合作建立起來的地方感與地方意象，這種對地方感的想像與建構過程，是一種透過排除、分類、揀選的過程所留存下來的地方感，而經過文化菁英與地方政府通力合作下所形成的地方感，是一種向「外」宣稱的地方感，強調的是特殊的地方價值以及具備觀光經濟效益的地方感。值得繼續追問地方博物館所建構「地方想像」弔詭之處在於：為何地方博物館所建構的地方感是向「外」宣稱的？為何「地方」本身必須強調具有觀光的「價值」？在南方澳地方博物館加入蘭陽博物館家族的現象中，可以發現地方政府對地方的想像是朝向以觀光立縣的文化政策，似乎回答

了為何文化政策對地方感的建構過程是朝向對「外」建構的問題。

然而，Pred（1983）在討論地方感與感覺結構之間的關係時，便提出了個人因為所處位置的差異而會有隨時變動不羈的地方感想像。那麼建構一個固定、具體想像的地方意象，與地方政府聲稱「地方博物館做為凝聚當地居民地方意識與地方認同」的理念又出現了怎樣的弔詭與衝突呢？地方博物館內所企圖建構的地方感與地方意象形成向「外」索求的地方感，這種經由地方博物館所建構出來的南方澳漁村意象與地方感，透過歷史圖像、文字、符號的共同運作，產製出屬於文化菁英與地方政府文化政策的地方感，不自覺的或刻意排除掉的是對地方概念窄化的想像。換言之，在地方政府文化政策上對地方概念的狹隘想像中，地方感的呈現在經過刻意的建構過程被發明出其所具有的「特殊性」，且此一特殊性在地方政府以文化觀光的政策導向下，還必須要兼具有「觀光消費」的附加價值。而歷史襲產與珍貴物品的展示，便成為南方澳地方博物館建構地方感過程中的首要選擇，當地居民的生活經驗因為不具有歷史襲產的價值而不被選擇進入地方博物館的展示櫥窗內。

5.2 觀光導向做為地方感建構的弔詭

有關地方博物館內的南方澳人論述與館外的南方澳人論述，透過田野參與觀察及訪談的過程，已經清楚地看出南方澳人在館內與館外所依循的指稱乃是建立在發言主體對於自身所處對地方感受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然而，對於地方博物館內所形構的南方澳人特質，在建構論述南方澳人的過程中，發現地方博物館與地方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合作關係，往往將地方本身所擁有的複雜多元特質予以簡化及同質化，屬於官方論述上對於地方的想像，固定鑲嵌在地方實體與區域範圍內的人文地景所創造出來的地方感，讓南方澳漁村在官方論述與當地文化菁英的共同構作過程中，企圖凸顯的是對過去歷史的無限緬懷以及從中汲取地方政府以「文化觀光」做為創造地方意象的狹隘想像。當地方博物館與地方政府文化政策上形成相輔相成、互相依賴的情況時，地方博物館淪為地方政府在建構屬於符合觀光形象的展示空間時，地方博物館將徹底地和當地居民形成脫節的狀態。地方博物館內透過圖像、文字、展示品的有心陳列，企圖將地方原先屬於流動的狀態定格在可供觀光客參觀、憑弔的場景之中，參觀者在進入地方博物館後將所聞所見的地方特殊性轉化成消費的快感，地方博物館在地方政府文化政策主導下將原先立意在做為「凝聚地方居民地方認同」的前提，變相成為一座提供觀光客參觀、消費的遊客服務中心。

Harvey（2002）的〈地租的藝術：全球化、壟斷與文化的商品化〉一文，看到資本主義內部矛盾，也建構出關鍵性的希望空間。Harvey透過探討資本積累邏

輯裡的「壟斷地租³」概念，來理解在全球化/在地化的辯證過程中，所產生的許多困境與難局，說明「資本擁有從無論來自何處的地方差異、地方文化變異和美學意義中，挪用和汲取剩餘的辦法⁴」（2002：12）。壟斷地租這個範疇具有三項矛盾：首先，一旦物品進入市場成為商品後，買賣本身就會破壞獨特性，因為商品化將帶來均質化。其次，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無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壟斷，尤其資本主義的「時空壓縮」傾向，讓許多地方產業和服務失去了地域保護和壟斷優勢。最後，支持地方發展壟斷地租的人正是那些最貪婪的全球化人士，他們反而是在敵視、排除全球化（2002：2-7）。他舉出法國酒類生意和當代觀光事業都宣稱自己具有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藉此掌握、維持壟斷地租的優勢，增加其區辨標記和集體象徵資本。而這些宣稱除了根據物理條件（如土質、氣候）或歷史事實（如建築遺產），也是「論述建構和鬥爭的結果」，皆仰賴「歷史敘事、集體記憶的詮釋與意義、文化實踐的涵義等等」的建構（ibid：9）。Harvey清楚地指出在全球劃下地方的矛盾之處，放在南方澳漁村的研究發現來解釋，我發現這種透過將一種原先不甚明顯可辨的「地方文化」予以「商品化」、「文化產業化」的過程，其實彰顯出來的正是全球化過程中，地方政府對地方文化的焦慮與不安，透過政策的介入以及在資本主義邏輯的生存法則下，地方政府透過「文化」治理的方式，以博物館做為地方治理的機構；權力的施行在過程中不易被地方直接察覺，但卻也同時抹消了地方內部的多元異質現象，透過博物館與節慶化的行銷手法，創造出一個個被發明的「地方特色與文化」，形成地方與資本發展之間的矛盾情形以及將地方博物館從一個脫離現狀的異質空間翻轉成為一個文化政策眼中的「希望空間」。

博物館和節慶生意化是個新思潮，一改過去藝術事業都應該由政府負責的想法。雖然也有人擔心文化機構太過商業化，但是博物館做為一門生意的想法已經漸漸形成（馮久玲，2002）。地方感的表述成為地方博物館與當地居民之間各自表述的自身體驗，地方本身成為一個可供觀光消費的場域，特別是經過博物館的巧妙包裝；一個個自身以符號做為地方代表性的地方博物館不斷地在南方澳漁村中出現，而與當地生活的居民群體形成一個獨立且疏離的隔閡，呈現出與地方政府文化政策口味相合並具有觀光消費價值的「地方圖像」，地方透過地方博物館與地方政府有心的包裝後，觀光的消費價值似乎儼然已成為地方博物館在建構「南方澳漁村」意象時的首要考量，換言之，地方博物館做為推銷地方的遊客中心，在這一波地方政府文化政策的推動下，成功地為「地方」定位為可供觀光、遊憩的地點，與當地居民之間的關係反而成為沒有交集的場域。

³ Harvey對壟斷地租的定義：「壟斷地租乃源於社會行動者專斷地控制了某些直接或間接可交易的項目（這些項目的某些關鍵面向乃獨特而不可重製者），歷經一段時間後，得以實現利益，增加所得」（2002：2）

⁴ Harvey擔心批評者將他的文章曲解為：「資本主義生產了地方文化，塑造了美學意義，並且主宰了地方創制，預先排除了為直接臣服於資本主義循環底下的任何差異的發展」（2002：12）

5.3 地方博物館外隨時流變的地方感

博物館對於物件的蒐集，囿於政策、經費、空間、可及性等，不可能無窮盡地收藏，也就不可避免地無法呈現所有的差異性；此時，必然將物件以「代表性」的姿態出現而隱藏了豐富的變異性，相對地呈現一種一致性（林崇熙，2003）。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內的收藏、展示情形，透過第三章的訪談與討論，已經清楚地說明了地方博物館在文化政策的影響下，如何對「南方澳漁村」意象呈現出相當的一致性。然而，地方博物館以外不受文化政策影響的當地居民，對地方感的自我感受過程中，將隨著個人對於地方上的日常感受與體驗而呈現出複雜且多音（因）的地方感。

在第四章地方博物館外的當地居民對地方感受的討論中，我試著從北方澳在政府軍事政策上對北方澳漁村的徵收，進而使得北方澳居民必須集體遷居到南方澳漁村定居，並且在媽祖宗教信仰的爭論上所造成的衝突來說明「南方澳人」與「北方澳人」的宣稱出現與衝突過程。另外則針對地方博物館在挑選地方文化圖像過程中，所忽略的當地男女性別分工、外籍漁工與外籍配偶進入南方澳漁村後對當地居民所帶來地方想像的影響，企圖以田野參與觀察與訪談的方式，挖掘出地方感想像本身所存在的複雜多變風貌。

Massey（1997）所提出的進步的地方感（*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概念曾針對過去對於地方概念的狹隘想像提出挑戰，她特別指出「性別」與「種族」的現象是被排除在地方感經驗的討論範圍外。我在南方澳漁村田野觀察與訪談的期間發現，「性別」與「種族」在當地居民或地方博物館構築地方感的過程中，確實被排除在地方意象的想像之外；也就是說，在地方博物館內對「文化/觀光」的想像，排除了漁村中不具有展示價值的漁村女性生活經驗以及外籍漁工、外籍配偶對地方所帶來的貢獻與威脅；這種封閉的、純種的、男性的南方澳漁村想像，在地方博物館內不斷地朝向觀光價值的的地方意象建構過程，被不斷地擴大；然而，本研究發現，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外的當地居民在型塑地方感時，性別與種族上的差異卻成爲他們在想像地方意象時最直接的指涉對象；從過去南方澳漁村的移民歷史以及近二十年來外籍漁工與外籍配偶在南方澳漁村的出現，當地居民對於地方空間必須在產業結構與人口結構轉型的過程中，與外籍漁工、外籍配偶分享土地空間的使用，以及地方朝向觀光化後，觀光人潮的湧入等現象，都使得當地居民在地方感的表述過程中，對地方的想像有別於地方博物館內所建構出來的南方澳漁村意象，地方博物館以外的當地居民眼中所看到的南方澳漁村是「我覺得自己像住在越南村」、「外籍漁工對地方女性的安全具有威脅」、「沒有我們這些女人處理家務，男人可以好好捕魚嗎？」等；對我所訪談的南方澳漁村居民，地方感的形成並不同於地方博物館內以過去繁榮歷史做爲地方感的投射基礎，每日生活經驗中與外籍漁工、外籍配偶的接觸頻率與密度、南北方澳媽祖廟

正統性之爭、女性對家庭的照護與岸上的漁業工作，反而成爲當地居民在感受地方真實性的重要依據。

當地居民地方感的形成取決於個人對地方特殊的感受經驗，性別上的差異、外籍種族對本地漢人血統同質性威脅的恐懼、對外籍配偶與外籍漁工工具性理性的想像等，都是構成當地居民在感受地方經歷全球化過程中，在地方感的消逝或強化形成不同於地方博物館內所構築的南方澳地方感。相對於地方博物館以觀光、消費、展示做爲建構地方特殊性的地方感建構；當地居民在這一場以地方文化做爲觀光消費的地方博物館運動中，直接經驗到的是外籍移工與外籍配偶進入地方後在使用空間與日常生活接觸上的衝擊。然而，這種對自身居住環境感受到的衝擊，卻也會因爲個人自身所處的位置、身份角色的不同，隨時調整對南方澳漁村的想像；在研究中發現，外籍漁工與外籍配偶在當地居民之間，當地居民對其有細微的分類狀態，而這種細微的分類狀態所做出對外籍漁工、外籍配偶的喜好、厭惡反應，會因爲當地居民與外籍漁工、外籍配偶的直接、間接關係，而呈現不同的態度表現。換言之，南、北方澳的媽祖正統性衝突、過去男女性別分工與角色的差異以及近年來外籍漁工、外籍配偶所帶來的地方感受，當地居民隨時都處在一個複雜且重疊的身份角色之上，並且也隨著個人的生命歷程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上，而隨時調整對南方澳漁村的想像，形成與地方博物館內以「物件符號」及「抽象的南方澳人特質」描述相當不同的地方感想像。

最後，本篇論文從陳其南討論台灣社會如何從移民社會轉變爲土著化社會的過程中，看到地域性認同是陳其南所指出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在南方澳漁村中的地方感概念討論過程裡，我發現這種所謂地域性認同的宣稱，其實不竟然是建立在土著化社會的過程，更爲直接的事實，可能是經過地方政府透過文化政策的有心操弄所形成的地域性認同，這一點在陳其南所寫文章的時代脈絡中可能還不明顯，但放置在台灣社會現今的地方概念思考時，Harvey 與 Massey 對地方感概念的討論或許提供了另一種解釋的可能。地方在主政單位的關注之下，成爲一個可以經過塑形的產品，進而經過特定挑選出的「文化意象」，將其包裝成足以提供消費的場域。地方本身多元歧異的本質，在經過商品化的粹煉後，地方博物館成爲提煉地方文化元素的火爐，文化治理的方式即是透過刻意雕琢與想像的地方意象，使得地方足以成爲可以再造資本剩餘價值的可能。然而，地方博物館外的在地居民生活經驗，卻以不同的姿態表達出對地方博物館現象的不以爲然，使得地方博物館成爲一個與地方切割的想像空間。經濟資本的再轉換主導了地方政府在想像地方文化的前提，博物館的生意化與文化經濟的創造，在這一波地方博物館成立風潮中，將地方予以框限在一個靜止的歷史框架中；然而，地方博物館外的天空卻依然各自有著不同於館內的展示內容，國家機器文化政策對地方的狹隘想像，透過地方博物館此一機制，扼殺了存在地方內部的多元可能性。